

论池田大作和平历史观的永恒价值

——纪念周恩来·池田大作历史性会见 50 周年

厦门大学 黄顺力

概要：本文从历史学的视角探讨池田大作和平历史观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阐释其认识日中关系的历史症结、存在问题及解决途径的理论与实践的逻辑关系，论证这一认知为推进和坚持日中友好，促进亚洲与世界和平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池田大作和平历史观的产生与形成一是源于佛教思想对生命的普遍尊重；二是感于因战争失去亲人的深切痛苦；三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正确认识；四是基于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定信念。在此历史观的指导和实践下，从 1968 年 9 月毅然发表著名的“池田倡言”，到 1974 年 12 月与周恩来总理的历史性会见，池田大作为推进日中友好、亚洲繁荣与世界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开创性贡献。池田大作和平历史观极具人类普适包容的永恒价值。

关键词： 和平历史观 和平与发展 历史性会见 永恒价值

一 引言

今年是中国周恩来总理与日本池田大作先生历史性会见 50 周年。半个世纪前那场不同寻常的跨国家民族、跨政治文化、跨制度意识形态、跨历史时空的里程碑式对话，至今对我们中日两国政府、两国人

民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人们常说：“拉长历史的镜头，才能看清当下的意义。”也常常说：“认知决定行动的方向。认知的深度决定发展的高度和力度。”本文从历史学的视角探讨池田大作和平历史观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阐释其基此认清中日关系的历史症结、存在问题及解决途径的理论与实践的逻辑关系，及其为中日友好与世界和平做出的巨大贡献。笔者认为，池田大作和平历史观是对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发展大势的深刻理解和清醒认识，是以历史经验与现实社会的相互观照，对大变局下人类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信念和美好追求。最重要的是，由池田大作这一和平历史观形成而来的深刻认知已成为中日关系发展朝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的奠基石！这正如本次研讨会研讨主旨所指出的：“为实现和平与发展，每一时代每个国家及人民都由于认知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有时也会适得其反。……在国家及地区间对立、纷争、冲突不断，在可持续的、和谐的发展受到挑战的世界局势下，文化间、文明间、人与人、人与自然甚至人与自我之间等不同层面的对话愈发迫在眉睫。如何理解对话的意义、如何更好地对话，如何更有效、合理、持续地实现和平与发展是须要我们深入思想（考）的主题。”因此，深入阐释池田大作的和平历史观，进一步发掘其在推进中日友好事业与世界和平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大力弘扬其极具人类普适包容的永恒价值，对于当下世界更加渴望和平与发展的迫切需求，我们一定可以从中获得更多、更宝贵的人生智慧。

二 和平历史观的产生与形成

思想观念是社会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头脑中的认知、意识和理念，它既是人类认识世界、变革世界的重要途径，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源泉。历史观则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对历史发展的整体把握之后的深切体验和认知启发，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里所要探讨的池田大作和平历史观，关键在“和平”二字，核心在于其“和平”的内涵与意义，这种独具特色且睿智深刻的和平历史观是指他依据历史经验教训所得出来的、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深邃认识，是对人类一定要走和平发展之路的殷切期许和坚定信心。

就整体而言，池田大作和平历史观的产生形成首先是源于佛教思想精髓对生命的普遍尊重。

作为睿智的佛教思想家和虔诚的佛教徒，池田大作极为强调对生命的普遍尊重，这是其和平历史观产生形成的出发点和理论逻辑起点。

众所周知，尊重生命是佛教人道主义思想的精髓¹，池田大作明确指出：“生命的尊严是普遍的绝对的准则。生命的尊严是没有等价物的，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²反复强调：“至高至尊至宝，除了生命之外，断然无他。”³他还认为，“佛法中所谓的‘佛’，意味着生命的内在的尊严；所谓佛法，也可以说是生命的内在的法则。”⁴“必

¹ 笔者 2012 年在广东韶关召开的“2012 池田大作思想研讨会”上提交《池田大作“宇宙生命观”探微》一文，对池田大作先生基于佛学思想提出的“宇宙生命观”作了初步的探讨，认为对生命的普遍尊重是池田思想的核心与基石。拙文载《走向 21 世纪的生命尊重》（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 4 月版；《池田大作先生「宇宙生命観」にふれて》（訳者 楊夢）

² 《池田大作选集》（卞立强编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12～313 页。

³ 《人生抄—池田大作箴言集》，圣教新闻社 2001 年，第 247 页。

⁴ 《池田大作选集》（卞立强编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第 312～313 页。

须把生命的尊严当做最高的价值，并作为普遍的价值基准。……生命是尊严的，比它再高的价值是没有的。”¹但形形色色的各种战争却都是戕害生命、荼毒生灵的罪魁祸首，而且不幸的是，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不论是东方或西方，我们说其大部分的历史都是接连不断的、涂上了战争色彩的悲惨的画卷，并非言过其实。”²

“战争的反复，甚至使人类历史可以称之为战争史。”³铁一般的事实已经反复证明，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每当（战争）这种悲剧重演，人类都付出巨大的代价”⁴，战争让人如同蝼蚁一般被杀戮，生命的尊严在战争面前荡然无存！对此，池田大作还从佛法的角度指出，人类历史上的战争作为一种“恶”业，“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所不得不做的是就是以杀人、破坏为目的，”⁵它不仅扭曲了人类“本源的欲望”，还诱导出“魔性的欲望”，而“（魔性）欲望的放纵会产生人们之间的对立抗争，导致生命和自然的破坏。”⁶因而，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是“绝对坏的东西”。“这个地球上虽然有着种种问题，但战争才是万恶的根源，是绵亘于人类史的‘业’。人如同蝼蚁一般被杀戮，战争使这样的疯狂行为日常化，也毁灭了一切人性。”⁷

正是基于对以往人类历史上各种战争的极度厌恶和对惨痛历史

¹【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眺望人类新纪元——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第483页。

²【日】池田大作、【意】奥锐里欧·贝恰：《二十一世纪的警钟》（卞立强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87页。

³【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38页。

⁴【日】池田大作：《和平世纪的倡言》（香港创价学会译），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45页。

⁵《池田大作集》（何劲松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⁶【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90页。

⁷【日】池田大作：《和平世纪的倡言》（香港创价学会译），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17页。

经验教训的认知，且感悟于佛教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精髓，池田大作产生形成了无比坚定的和平历史观，并依此成为其终身致力日中友好，孜孜追求世界和平的思想缘由。由此可见，不论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事实的广度，还是从佛法思想核心精髓的深度，池田大作首先是通过生命的普遍尊重构筑起其和平历史观的坚实根基，也成为其终身主张和平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

其次是感于因战争失去亲人的深切痛苦。在残酷的战争年代，池田大作的4个兄长都先后被送上战场，他的大哥喜一曾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愤怒地说：“（侵华日军）那样做，中国人太可怜了，日本军国主义实在太坏了！”后来大哥喜一在缅甸战死，给父母和家人带来极大的痛苦。父亲悲愤地说：“战争不该进行，只有使两国人民遭受不幸。”母亲在得知儿子战死噩耗而转过身时那悲痛欲绝的背影，深深地烙刻在池田大作少时的脑海里。这一悲惨的痛苦记忆和人生原始性体验使他特别憎恶战争而向往和平。后来，池田大作曾在许多场合都说过：“我的大哥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死的。我至今仍不能忘记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时的悲痛的面孔。出于生命的痛苦而反对残酷的战争，是扎根于共同的体验之中，所以我们的心是相通的。这种反对战争的立场是超越理论或政治范畴的、出自内心深处的愿望。这也可以说是来自生命的冲动或呼喊吧。”¹ 我们知道，有着同样东亚儒家文化背景²的池田大作对历史的态度也有着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意识自觉，他多次强调要“把历史理解为照出现在的镜子和照耀现代的

¹ 《池田大作选集》（卞立强编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7页。

² 黄顺力：《论池田大作和平思想的儒学意涵及其普世价值》，载《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平和·文化·教育》第2号（日本创价大学）2006年2月（日文版）。

光源”，¹历史上“有一些危机可能使人类陷于灭亡，而我认为最悲惨而又最愚蠢的就是战争。”²“作为一个佛法者，我确实认为如不转变‘战争’这一人类的‘业’，真正的幸福和安宁就不会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没有比战争更悲惨、更残酷的了’，（这）就是人类用巨大代价换来的教训。”³“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故此，尊重生命，反对战争，向往和平就成为他终生孜孜以求的崇高目标，并构成其和平历史观最基本的认知准则。这一认知准则鲜明地反映在他于 1968 年 9 月 8 日发表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中：“（提倡日中友好）我们理所当然的要站在佛法的立场上，以人为根本，并遵循世界民族主义，祈愿世界和平和日本的安泰。”⁴可见，主张日中友好，追求世界和平正是其历史观认知决定行动方向的具体表现！

第三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正确认识。

池田大作对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文化特征有过这样的深刻思考：“东亚地区的文化，特别是构成其潮流的风土人情、精神思考，具有什么特征呢？当然这并不是可以笼统地一概而论的，但假如予以简单的描绘，那么大概可以说这地区贯通着一种‘共生的 ethos’（共生的道德气质）。在比较温和的气候、风土里孕育出一种心理倾向，就是取调和而舍对立、取结合而舍分裂、取‘大我’而舍‘小我’。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共同生存，互相支持，一起繁荣。而这

¹ 《池田大作集》（何劲松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5 页。

² 【日】池田大作、【意】奥锐里欧·贝恰：《二十一世纪的警钟》（卞立强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1 页。

³ 【日】池田大作：《和平世纪的倡言》（香港创价学会译），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7 年版，第 218 页。

⁴ 《中国的问题正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见《我的中国观》，（卞立强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 页。

种气质的重要源头之一，不用说就是儒家。”¹但紧接着他非常明确地指出：“不过，我决不是用‘共生的道德气质’一语来遐想儒家的‘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这些传统德目，在重视先于个人的共同体这一点上与‘共生’相通，但另一方面，却固定了既存的等级秩序，使社会停滞不前。”²这种涂满历史污痕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当然要遭到猛烈的批判！但他认为“所谓‘共生的道德气质’，并无限定或固定于君臣、父子、夫妻、公司、家庭等关系中，而是一种比发自本能更纯粹的、能活跃地扩展和脉动的普遍心情。‘ethos’所指的道德气质、民族气质，当然不同于老庄的‘无’或‘混沌’，但它也绝对不束缚人和社会，能随着时代变化，灵动、生动地因应，是一种本来属于开放性质的心情和力量。”³

这一阐释不得不令人惊叹池田大作对以“儒家文化圈”为代表的东亚文化特征的观察竟然是如此的深刻！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池田大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做的演讲《21 世纪与东亚文明》⁴（1992 年 10 月 14 日）一文很值得我们一读再读并反复思考仔细领会。正是对这种“像地下水脉般贯通于数千年历史”的“东亚精神的升华——‘共生的道德气质’”的深刻认识，池田大作在其著名的“池田倡言”中呼吁说：“中国是一个拥有七亿一千万人口的巨大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具有三千多年大河一般历史源流的伟大民族。她的思考方式是非常复杂的。如果简单地下结论，必然会碰壁；如果气量狭小地来谋算，

¹ 《21 世纪与东亚文明》，见《我的中国观》，（卞立强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5 页。

² 《21 世纪与东亚文明》，见《我的中国观》，（卞立强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5 页。

³ 《21 世纪与东亚文明》，见《我的中国观》，（卞立强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5-116 页。

⁴ 《21 世纪与东亚文明》演讲稿一文载《我的中国观》，（卞立强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3-121 页。

一定会犯意想不到的错误。”¹并且多次极为明确地指出：“我认为中国三千年的历史，能够给予我们很多的启示。纵观中国的历史，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与其说中国是一个‘尚武’的国家，不如说她是一个‘尚文’的国家。……同世界文明史中经历过盛衰荣枯的其他强大帝国相比，在中国的历史中，很难发现单纯凭借武力，明目张胆地推行武力主义和侵略主义的例证。尽管一时性的武力主义也曾勉强推行过，但毕竟很快便为文化及文明那大海般的力量所吸收。中国被称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在其卷帙浩瀚的史书中，只消信手翻阅几册，就可以发现其中处处充满着伦理性和伦理感。正因为中国是一个‘尚文’的国家，才有可能产生这样的力量，抑制惟利是视的武力侵略主义。”²除此之外，池田大作还援引中国先贤孔子的“仁爱”精神、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为例，指出孔墨的“仁爱”、“兼爱”学说虽然带有中国古代思想家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却为后世的思想家开启了人道主义和平思想的智慧之门³，并特别赞同：“墨子的主张，即普遍的爱。这种精神最切合时宜。墨子关于舍去利己，树立爱他的兼爱学说，是反对侵略战争的理论先导。”他认为，从历史是现实的观照这一角度来看，墨子的“这种理论是极为现代化的。只是墨子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是指中国，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⁴正是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正确认识，促使池田大作能

¹ 《中国的问题正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见《我的中国观》（卞立强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 页。

² 《走向和平之康庄大道》，见《我的中国观》（卞立强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9-80 页。

³ 参见黄顺力：《论池田大作和平思想的儒学意涵及其普世价值》，载《平和·文化·教育》（日本创价大学和平研究所），2005 年第 1 期。

⁴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年版，第 425~426 页。

在半个多世纪前日中两国之间远没有恢复邦交，甚至连战争状态也还没有真正意义的结束的复杂形势之下，即以卓越的目光远见和非凡的勇气胆识，公开呼吁日本要与中国恢复邦交正常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积极推动日中友好和亚洲与世界和平。这种“豁出性命的战斗”¹的勇气和胆识正基于其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正确认知。中国有句古语说：“读史能使人明智”。在这方面，池田大作为我们做出了极好的榜样。

第四是基于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定信念。反对战争，向往和平成为他反思历史，面对现实的认知准则，也成为其由认知的深度决定发展的高度和力度的崇高座标。

在这一点上，池田大作和平历史观的“和平”二字，及其思想内涵体现得尤为鲜明深刻！对于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形形色色的各种战争，池田大作认为：“战争，不管是出自什么样的大义名分，也是绝不允许的。”因为“不管任何理由，世上绝对没有‘正义的战争’。受苦的只是百姓、家属和母亲。”²但人们普遍的战争观却把战争看成或是保护国家民族利益的正当行为，或是实现这一利益的手段，极尽全力把战争渲染成“爱国”的行为，结果，在“爱国”的旗号下，大批青年被送上战场，成了人类“魔性的欲望”的牺牲品。对此，池田大作明确指出，爱国心作为一个人的至关重要的问题而言，可以称之为一种美德，因为“热爱自己生长的土地和社会，使其进一步发展，这种愿望是原来怜爱自己的生命，希望改善生活这种根植于本性的感

¹【日】西园寺一晃：《周总理一定要会见的人》，《创价》1997年9月号。转引自卞立强编译：《日中恢复邦交秘话》，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86~89页。

²【日】池田大作：《法华经的智慧》，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4页。

情，向社会动机转化的结果。……没有这样的热情和魄力，恐怕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社会发展。”¹ 但如果这种满腔热情的“爱国心”“一旦被利用来卷入国家对国家的对立中，就会带上邪恶的色彩。这是因为人心的自然表露，被国家这个完全不同领域的原理改变了形态。”他深刻地认识到：在历史上，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关系，经常被看作是敌对的关系，结果“在国家主义的影响下，不知有多少青年的纯真的爱国心被歪曲、被利用、被蹂躏——因此，本来对自己生存社会的纯真的爱，却变成了对其他国家国民的憎恶或蔑视。本来是自己和社会共存的理念，不知不觉变质成为为国家和社会而牺牲自己了。”² 因此就这个意义而言，“现在不可能有什么保卫正义的战争，就是说战争本身已消灭了正义。”³一句话，作为和平对立面的战争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避免，都必须加以摒弃！这也是池田大作极力主张通过对话而不是通过战争来解决矛盾争端的立论所在。

再者，池田大作对许多人认为战争能促进国家经济和技术发展的说法也绝不赞同。他说：虽然“从历史上看，我们不能否认战争一直是经济发展的巨大因素。在战争这一非常时期，一个国家的所有力量都要优先集中用于战争的目的。一切社会活动都要服从和服务于争取胜利这一大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最合理、最有效的形式。”⁴ 但战争的发动却会造成反复不已的恶性循环，而且人类必定要受到

¹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年版，第 225 页。

²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年版，第 225～226 页。

³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年版，第 235 页。

⁴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国际

战争的报复和反噬，只不过下次战争爆发的时间点、报复反噬的方式不同而已。不论是谁，只要发动战争，就“不仅对敌国而且对包括自己国家在内的地球上的整个人类的生存（都）构成了威胁，”¹而那些以保卫国家为借口而要求青年们牺牲生命的侵略战争，更是“把别国的国民和自己国家的国民都推入苦难的深渊。”²因为事实上，在所有能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因素中，战争的代价是最高的，不仅毁灭生命，破坏环境，还可能使人类陷于灭亡，“最悲惨而又最愚蠢的就是战争。”³这就是人类用巨大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

此外，在历史上，“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现象俯拾皆是，但“战争还不断地被许多人赞誉为推动文明的力量。（那些）粉饰着古代社会的英雄群像，几乎都建立在民众的尸骨上。人们只是仰慕他们，从不以谴责的眼光看待他们。”⁴这种历史观的认知是极为错误且极其令人担忧的。池田大作指出：无论以什么借口发动的战争其实都是一种纯粹的恶，都是对人的生命尊严的践踏。因为“人要像人一样生活，首先必须要承认自己的基点——生命的存在这一大前提，并把立脚点放在这里。”⁵只要作为人，就要“以生命的眼光”，而不是“以国家的眼光看人”；只要能尊重生命，不再肆意践踏生命的尊严，就可以避免战争，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

文化出版公司 1985 年版，第 230 页。

¹【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年版，第 238 页。

²【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年版，第 239 页。

³【日】池田大作、【意】奥锐里欧·贝恰：《二十一世纪的警钟》（卞立强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1 页。

⁴【日】池田大作：《池田大作集》（何劲松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 页。

⁵【日】池田大作：《池田大作选集》（卞立强编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0~91 页。

令人心悦诚服的是，作为一位日本人，池田大作还屡屡以曾经走上战争歧途的旧日本为例，公开无情地鞭挞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侵略中国、侵略亚洲各国的罪行，这既展示了其佛教思想家公正无私的坦荡胸怀，也凸显出其和平历史观的当代价值。这种旗帜鲜明的、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进行深层次反思的态度成为推进日中友好的坚强基石！

三 和平历史观的永恒价值

前已述及，池田大作指出，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战争是人类之间交流和“对话”的一种最为常见，但又是最具危害的方式，人类每次都要为此付出巨大而痛苦的代价，因而我们绝不能忽视历史的惨痛教训，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故此，池田大作强调在日中关系问题上，首先是要以人为本，正确认识历史问题，“过去日本军国主义蹂躏了中国，将来一定要拂拭这段历史的污点，重新巩固日中两国两千年的友好桥梁。”¹笔者认为，这既是池田大作和平历史观的价值准则，也是中日关系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古语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忘历史，不是要纠缠过去，更不是要记住仇恨，而是要有正确的历史认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

德国前总统罗曼·赫尔左克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对其历史的彻底了解，它就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侵华的历史是无法也是不能忘记的。而对日本人而言，则是应该如何正确

¹ 高村忠成：《改变了历史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载《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未来》，创价大学 2008 年 9 月 14 日，第 16 页。

地省思那段历史。中日两国历史问题的纠结往往会直接并严重影响中日两国的现实关系，因此，历史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树立培养正确的历史观。为了不把“过去的战争伤痕的沉重包袱”，遗留给“同过去战争没有关系的”、“将来要承担两国前途的”日中青年一代，极力倡导在民众中，尤其是青少年中树立起正确的历史观，使日中两国能够互相援助、互相爱护，共同驱散笼罩着战争的残酷和贫困的乌云，照射进希望与幸福的灿烂的阳光。¹池田大作的和平历史观无疑对我们处理中日关系，促进中日友好，乃至我们“应如何处世、生活”的人生态度都有极大的启迪意义和永恒价值。

其次是和平历史观的核心和本质在于“和平”，它要跳出意识形态的束缚，立足于广阔的国际视野，以世界民族主义的理念为中日友好、亚洲繁荣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早在 1968 年 9 月，池田大作在其著名的“倡言”中就大声呼吁：“为了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必须要和任何国家和睦相处。在核时代的今天，能不能拯救人类，关键是能不能建立起超越国界的友谊。”²要与任何国家和睦相处，建立起超越国界的友谊，就必须跳出意识形态的束缚，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民族主义理念：“国家和民族在国际社会中不能是像过去那样唯利是图的集团。只有立足于广阔的国际视野，主动地为和平和繁荣以及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地作出贡献，才能称得上新世纪的有价值的民族。”³

半个多世纪前，因为在和平历史观中“和平”这一核心意涵的引

¹ 《中国问题正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见《我的中国观》，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 页。

² 《中国问题正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见《我的中国观》，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 页。

³ 《中国问题正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见《我的中国观》，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 页。

导下，池田大作以伟人的眼光、胸怀和勇气，毅然在当年复杂险恶的形势下公开呼吁日中关系正常化。这种超越国家、民族、地区，超越意识形态，超越政治制度而达至世界和平、人类幸福的普适包容的价值追求，正是我们在当下思考、处理中日关系，乃至处理国际关系所应具有的基本理念，其永恒的时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还需要提及的是，如同池田大作和平历史观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正确认识一样，我认为，人们对当今中国的和平崛起也要有正确的认识。

池田大作一贯认为中国“有着辉耀世界史的历史，有着人本主义的特质，有着和平与和谐的伟大的文化力量。它一定会成为 21 世纪的路标，普照全人类。”¹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美关系正常化已逾半个世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业已 46 年，这半个多世纪来各方良性的交往互动，使得中国能在处于较好的内外环境下快速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对于这一切，我们也抱有深切的感恩之心，并同时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回馈国际社会，特别是在帮助同样是发展中国家上更是如此，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共同维护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国际环境，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之后，国际上出现了一些“中国威胁论”的杂音，制造了一些妖魔化中国的幻象，造成了当下国际间对立情绪日益增长的严重局面，这真是不应该也不能继续发展下去的负面趋势了！因为拙文篇幅的关系，笔者只能简短的引用“池田倡言”中语重心长的一段话作为我们进行冷静深层的思考：“与其徒然

¹见《我的中国观·中文版序言》，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 页。

制造侵略幻影的威胁，加强武装，增厚反共的硬壳，巩固安全保障体制，还不如提高大众的福利，这才是最高的安全保障，才是对付暴力革命浪潮的最强韧的防波堤。”¹有着数千年大河般历史源流的中国富起来、强起来对世界是好事，而不是相反，“如果简单地下结论，必然会碰壁；如果气量狭小地来谋算，一定会犯意想不到的错误。”²

四 简要结论

池田大作生前寄厚望于新世纪的发展：“一是人类应当具有的价值观，不应该狭隘地将其基础仅仅置于一个社会或国家之上，（而）必须立足于全人类和全球的观点。二是我们说人是生命的存在，乃是超越任何社会、国家和民族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的事实。”“现代所必要的立脚点是：纵的方面要立足于人的存在的根源——生命的存在；在现实的行动上，横的方面要结成共同具有这种生命的存在的地球人类这一普遍的团结。通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扩大地球人类这一普遍的团结，在我们的地球上消灭一切战争，建立平等互惠的地球社会。”³

历史是现实的观照，也是现实与未来的启迪。“和平”是池田大作历史观的真谛与灵魂，其独具特色的思想内涵及其成功实践，不仅对处理中日关系问题有现实意义，而且对维护中日友好与世界和平具有普适包容的永恒价值。从1968年9月发表振聋发聩的“池田倡言”，到1974年12月与中国周恩来总理的历史性会见，池田大作为推进中

¹ 《中国问题正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见《我的中国观》，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² 《中国问题正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见《我的中国观》，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³ 何劲松编：《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日友好、亚洲繁荣与世界和平做出了开创性的辉煌贡献。我们在这里探讨池田大作和平历史观的永恒价值，并隆重纪念周恩来•池田大作历史性会见 50 周年的意义正在于此。

作者简介： 黄顺力 历史学博士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通讯地址：中国福建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 邮编：361005

电话：13959216208 邮箱：s1530824@xmu.edu.cn

hs16971@hotmail.com